通 知 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15 日

受文者: 俊美珍先生

主 旨:檢送「第三十期〈春季號〉中國學術年刊」審查意 見,敬請 查照。

說 明:台端之文稿業經審查通過,請 參酌審查意見及撰 稿格式(格式請參本系網頁),惠予修改,並請於 12月24日(星期一)前將論文(A4列印稿一份) 與磁片(磁片封面請註明作者姓名、篇名與聯絡 電話),惠寄本刊編輯委員會,俾便編輯作業順利 進行。

※如有疑問請電洽簡助教 聯絡電話:(02) 23630149 轉 133

中國學術年刊編審委員會

# 談八股文的研究與文獻\*

### 侯美珍

#### 摘要

本文首先強調八股文對明清兩代深刻的影響,呼籲學者重視八股文的研究。續又分析八股文研究不振之故,乃因今人抱持著負面印象,且八股文文體極難,令研究者望而卻步。就文獻的角度而言,科舉文獻涵蓋廣闊,制度因時修正,建立研究的基礎知識頗爲不易。而八股文過時即廢,加上清末廢除科舉,使文獻的湮滅更爲嚴重。八股文在內容、形式、遣詞用語等,受到嚴格的束縛,加上揣摩考官所好、追逐風氣所趨,此皆使今人在辨識、論定時文作者的風格更爲不易。

關鍵詞:八股文、明清科舉、科舉文獻

2

<sup>\*</sup>本文獲得九十四年度行政院國科會專題計畫補助,特此致謝。

Remark on the studies and bibliography of eight legged essays

Ho, Mei-chen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bout the influence that eight legged essays ha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arouse scholars' concern to eight-legged academic studies. By virtue of lacking studies on eight legged essays, this thesis will be analyzed the reasons why there is a negative impression in scholars' minds due to the difficulty of the writing style. Regarding the bibliograph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reference dimension of which is extensive,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at time was reformed easily by officials. Hence, building up the datum for academic research became tougher. Eight legged essays were abolished rashly while the styles of writing were out of date, even only afte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abrogated that made a great loss of the bibliography. Eight legged essays were constrained by the content, forms and lexical usages, moreover; they could be fathomed to acquire examiners' preferences of article styles by examinees. Therefore, the tendency made it arduous for modern scholars to

Key words: Eight legged essay, Ming-Q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bibliograph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distinguish and discuss the examinees' writing styles.

3

# 談八股文的研究與文獻\*

### 侯美珍

#### 一、前言

明清科舉取士,鄉、會試分三場試士,考試內容雖或涵蓋論、表、策、試帖 詩等多種,而中與不中的重要關鍵,主要仍取決於首場的八股文。「八股文有諸 多別名,如:「八比」、「制藝(義)」、「時藝(義)」、「近藝(義)」、「經藝(義)」、「舉業」、「時文」等。就其出題的難易、偏全、冠冕與否,可分爲「大題(文)」 與「小題(文)」;<sup>2</sup>就其從《四書》、《五經》出題的不同,又可分爲「書藝(義)」 和「易藝(義)」、「詩藝(義)」……等。

八股文知名度很高、爭議性也很大。雖然是明清讀書人念茲在茲者,然以其作爲「敲門磚」之用,爲大雅所不屑。隨著應考者聚、錄取率低,考生屢試不中的憤怒轉爲對八股的指責,鄙棄八股的言論,拈來即是,尤其是在明末、清末時局動盪、內憂外患之際,批評的聲浪達到最高點。知識份子咸將矛頭指向八股取士,或言此乃愚民政策,使士子荒疏不學、敗壞人才,甚至說八股是導致亡國的罪魁禍首。自光緒末年廢除八股取士,學者對八股文更爲疏離,往往延續前人對八股的惡評,常常引述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中的「八股行而古學棄」,「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3並加上封建、陳腐、愚民……等謾罵,看似理直氣壯,然不過拾前人之陳言,相襲成風,以爲理所當然,實則多半未看過八股文。

涂經詒(1925 - ) 曾感慨中、外版的中國文學史,「要不是全然無視於這種文體的存在,就是用最不經意的介紹,來予以最大的輕蔑。4虧健行(1937 - )

<sup>\*</sup>本文獲得九十四年度行政院國科會專題計畫補助,特此致謝。

<sup>&</sup>lt;sup>1</sup>參筆者:〈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12 月), 頁 277 - 322。

<sup>&</sup>lt;sup>2</sup>參筆者:〈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臺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06年12月),頁153-198。 <sup>3</sup>以上三則,分見〔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4月),卷20〈書傳會選〉、卷1〈朱子周易本義〉、卷19〈擬題〉。

<sup>&</sup>lt;sup>4</sup>涂經詒撰、鄭邦鎭譯:〈從文學觀點論八股文〉,《中外文學》第 12 卷第 12 期(1984 年 5 月), 頁 167。

教授也指出,在九十年代前,由於學者對八股文的發展過程和文體本身無確切的 認識,常執定全盤否定八股文的成見,只要有必須列舉負面因素處,便把八股文 當作其中一項任意加插進去,而不論實情爲何。<sup>5</sup>八股文雖有其負面的影響,但 忽略,或者謾罵、輕蔑與栽贓式的評論,究竟不是學術研究應有的態度。

民國十九年周作人(1885 - 1968)曾暢言八股研究的重要,因八股是中國文學史上承先啓後的一個大關鍵,也是中國文化、文學的結晶,主張大學應大講八股。6在清末眾人口誅筆伐、廢止八股取士後,周氏以文學史的宏觀,提倡八股研究的重要,可謂獨樹一幟。今之研究八股文的學者,也常引述周氏之言,推重其見解。雖周作人呼籲重視八股文的研究,但回響甚微。民初盧前(1905 - 1951)作《八股文小史》7、商衍鎏(1875 - 1963)作《清代科舉考試述錄》8,也沒有帶動八股文研究的風潮,只是陸續有一些零星的著作問世而已。時至今日,八股對吾人而言愈發陌生,啓功(1912 - 2005)嘗云:曾遇到用「八股」這二字作爲貶義詞的人,「竟不知它是一種文體的名稱,更不用說八股爲什麼那麼壞的理由了」。9劉祥光教授云:「歷史上大概沒有那種單類文獻像時文一樣,曾有那麼多人投注那麼多心力和時間在那麼窄的範圍內,曾決定那麼多人的前途,且曾受到那麼多人的讚揚和譴責,卻在文學批評史裡絕少受到注意。」10由是之故,筆者在本文中,首先強調作爲一種沿用近五百年的考試文體,讀書人讀八股、作八股的數量驚人,坊間充斥著時文選本,八股文的影響是既深刻且全面的,盼學界能共同來耕耘這塊前人較忽略的領域。

在拙作〈毛奇齡「季跪小品制文引」析論 - - 兼談「稗官野乘,悉爲制義新編」的意涵〉<sup>11</sup>一文的〈前言〉部份,筆者已曾概略指出今日學者從事八股文研究的困難,限於篇幅未能深入。民國以來,學者罕少涉及八股文研究之故,除因八股惡名昭彰外,八股文體之難,重「時」、尚新變的特色,亦造成今人解讀的

<sup>&</sup>lt;sup>5</sup> 鄭健行:〈談八股文體與其發展歷史--九十年代前大陸學者對八股文的態度和認識〉,《科學考試文體論稿:律賦與八股文》(臺北:臺灣書店,1999 年 5 月 ),頁 255 - 267。

<sup>&</sup>lt;sup>6</sup>周作人:〈論八股文〉,《看雲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6月影印民國廿一年上海開明書店版),頁144。此文後署「十九年五月」。

<sup>&</sup>lt;sup>7</sup>盧前:《八股文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5月)。

<sup>&</sup>lt;sup>8</sup>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臺北: 文海出版社,1975 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影印 1958 年北京三聯書店印本)。

<sup>&</sup>lt;sup>9</sup>啓功:〈說八股〉,收入於啓功等合著:《說八股》(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7月),頁1

 $<sup>^{11}</sup>$ 筆者:〈毛奇齡「季跪小品制文引」析論 - - 兼談「稗官野乘,悉爲制義新編」的意涵〉,《臺大中文學報》第 21 期(2004 年 12 月),頁 185 - 214。

困難。就文獻的角度而言,科舉文獻涵蓋廣闊,制度因時修正,建立基礎知識頗 爲不易;時文文本過時即廢,湮滅嚴重;選家所錄,真爲難辨,……此皆使吾人 在辨識、論定時文作者的風格更爲吃力 - - 或者無能爲力。筆者在本文中,呈現 這些八股文研究的諸多問題、疑難之處,期能提醒研究者在擇題、從事研究時注 意,以收提升研究品質之效。

#### 二、 八股文研究的重要性

不少的學者,是從八股文作爲考試文體的影響,來強調研究八股文的重要 性,如馬敘倫(1884-1970)言:八股文集雖漕擯棄,但「撰文學史者斷不能將 占有數百年勢力與國家民族之治亂盛衰有關者,缺而不著」。<sup>12</sup>涂經治云:「八股 文的寫作,是世界史上獨一無二——幾近五百年間,風行全國的主要文章體制。 單就此點而言,已夠重要而值得對它認真的研究了。 13

八股文的影響,實不容輕估。晚明陳際泰(1567-1641)嘗言:「聚天下之 刻文,便可塞今日常山缺口。」14清初吳肅公(…1697…)云:「明有天下,以 時藝設科,時文之牘以億萬計。」<sup>15</sup>晚清龔自珍(1792-1841)形容坊間時文刻 本之多「如山如海」。16在科舉掛帥的時代,時文選本泛濫書坊,八股文也無孔 不入地滲透淮明清社會。

而學子讀八股、背八股、作八股的數量更是驚人。章學誠(1738-1801)曾 詢問書院諸生背誦八股的情形,諸生回答:「誦憶先正文字,多者六七百篇,少 者二三百篇。」至於泛閱的數量,章學誠以爲「一切名門大家房行窗稿程墨試牘, 務官觸類旁誦,少或三數千篇,多至萬有餘篇」。<sup>17</sup>意達數千、甚至上萬之數。 至於寫作時文的數量,萬曆十四年(1586)狀元唐文獻(1549-1605)在家訓中 勉勵子弟「作文必要每月三十篇」、「一年須作經書文三百餘篇」,強調當年自己 科舉失利後,「後每三年必作文千篇,或有至千外者」,因此文機純熟而後得中。

<sup>12</sup>馬敘倫:〈八股文程式〉,《石屋續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 211。

<sup>13</sup>涂經治撰、鄭邦鎮譯:〈從文學觀點論八股文〉,頁 167 - 168。

<sup>14 [</sup>明] 陳際泰: 〈楊子常全稿序〉,《巳吾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順治李來泰刻本),卷 3,頁8。

<sup>15 [</sup>清] 吳肅公:《讀書論世》(《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詒清堂刻本), 卷3, 頁12-13。 <sup>16</sup> [清] 龔自珍:〈擬釐正五事書〉,「清] 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計,《近 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5輯影印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刊本),卷74,〈禮政〉,頁9-11。

<sup>17 「</sup>清〕章學誠:〈清漳書院留別條訓〉,《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8月),頁 670 - 671 °

<sup>18</sup>從自幼習文、參加小考始,讀書人與八股爲伍長達三、四十年之久恐怕是常見的。亦有八、九十歲的白髮老翁猶鍥而不捨應試者,<sup>19</sup>這些老翁讀八股、作八股的時間當遠逾一甲子。以每年作三百餘篇計,動輒上萬。讀書人所讀、所背、所作時文的數量如此可觀,與時文爲伍的時間又長達數十年之久,時文稿充斥市面殆有以也,讀書人受到時文的浸染也無庸懷疑。

推動「科舉學」不遺餘力的大陸學者劉海峰(1959 - )教授曾言:科舉學是與大部份知名人物、大部份書籍和幾乎所有地區有關的一門學問。現有的研究成果雖不少,但與科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和影響、資料的宏富程度相比,還是很不相稱。很多問題尚未充份研究,或者存在明顯的錯誤等待糾正和澄清,在涉及中國人文歷史的學問中,很少有像科舉這樣地位重要、文獻眾多,價值甚高卻尚未被充份研究者。由是之故,劉教授將科舉學比喻爲一座少有的「學術富礦」,可以從歷史、教育、政治、文化、社會、文學等多角度進行開採。<sup>20</sup>八股文的研究,也是「科舉學」中的一環,上述的形容亦可適用於八股文的研究上。

例一:學者言:明初宋濂(1310-1381)〈閱江樓記〉深受八股文影響,「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方面,都可以從〈閱江樓記〉中看到八股文的影子。這是說明初宋濂古文創作與時文創作之間的交叉影響。」<sup>21</sup>

辨證:顧炎武云:經義文於明憲宗成化(1465 - 1487)以後定型,即流俗所謂之八股文。<sup>22</sup>明初的經義,尚未形成嚴格的股對體裁,八股文猶未誕生,洪武年間的宋濂怎可能會受到八股文的影響?

例二:學者引述周作人壬寅年十一月日記「予之拚與八股尊神絕交者,其義如此」等語,讚揚:「難得的是,他很早就轉而對八股文採取了批判的態度」、「此種批判的自覺,使他能夠跳出字籠,清醒反顧,見其真相。」<sup>23</sup>

辨證:壬寅年爲光緒二十八年(1902),時已廢八股改策論,故就周作人此

 $<sup>^{18}</sup>$  [明] 唐文獻:〈家訓〉,《唐文恪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楊鶴崔爾進刻本),卷 16,頁 7、14。

<sup>19</sup>據統計,從乾隆三十五年至五十九年這二十五年間,通計各省考取舉人的秀才,年屆九十歲以上者,計三十七人;年屆八十以上者,多達四百二十三人。參莊吉發:〈爲國求賢 - -從檔案看清代的科舉考試〉,《故宮文物月刊》第8卷第4期(1990年7月),頁34-47。

<sup>&</sup>lt;sup>20</sup>劉海峰:《科舉學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8 月 ),頁 5。

<sup>&</sup>lt;sup>21</sup>陳書祿:《明代詩文的演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頁634。

<sup>&</sup>lt;sup>22</sup> [清]顧炎武:〈試文格式〉,《原抄本日知錄》,卷 19,頁 479 - 480。

<sup>&</sup>lt;sup>23</sup>舒蕪:〈八股文與新文學運動〉,《周作人的是非功過》(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 頁 567 - 568。

則日記來說,並非「先知」,而是「後覺」,學者不明清末科舉改革的進程,稱讚問作人「很早就轉而對八股文採取了批判的態度」,有過譽之嫌。

考察學者在八股文領域的研究,似較留意八股與文學的關係,八股對詩文、戲曲、小說、批評等影響,都有所關注,然八股文的影響,固不僅限於文學一端,八股文的學習、寫作,是明清士人養成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對士人的性格及當時文化、學術等多方面的影響也不言可喻。金克木(1912 - 2000)云:「若對八股毫無所知,對古代文學和古時讀書作文之人的了解能夠全面而深入嗎?恐怕至少是會有一點欠缺的吧?」<sup>24</sup>涂經詒認爲,從中國思想史的觀點來說,許多八股文中的材料,是研究明清孔孟儒家學說、尤其是理學的豐富寶藏。<sup>25</sup>葉國良教授也指出,八股文「很像宋代某些不事訓詁、發抒經旨的經學著作」,認爲可將八股文「視爲儒學研究的資料」。<sup>26</sup>然而時至今日,筆者仍罕少看到學者研究明清思想史、儒學、經學,自八股文取材者。

研究時罕少取資於八股文,重要的原因之一,當如吳承學(1956 - )教授所言:以往八股文常因臭名昭彰,「往往被懸置在學術研究的範圍之外」。<sup>27</sup>八股文的認識和研究本極困難(詳後),加上長期被鄙視、懸置、忽視,使學者涉獵時,缺乏認識的基礎,以致無法拉近與八股間的距離。吳承學教授又言:八股文「畢竟是風行數百年、關係到知識分子前途命運的文體。毫不誇張說,八股是對於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生存狀態影響最大的文體之一。」<sup>28</sup>客觀回顧歷史,八股乃是明清讀書人汲汲營營之所在,不管考中與否、得意或不得意,皆在其生命中烙下深深的印記。所以,不論八股文是否猥下、陳腐、封建……,都有一探究竟的必要。

## 三、 八股文體之難

八股之難,讓昔日士子習文時,吃足了苦頭;讓今人研究、批評時,隔了道 難以跨越的鴻溝。使得八股因臭名昭彰,長期遭到鄙視外,又因文體之難,令學 者望而卻步。

八股之難,古今眾口同聲。清伍涵芬(…1687…)云:

8

<sup>&</sup>lt;sup>24</sup>金克木:〈紅樓八股硯香詞〉,《讀書》1993年第8期(1993年8月),頁81。

<sup>25</sup>涂經治著、鄭邦鎭譯:〈從文學觀點論八股文〉,頁 175。

<sup>&</sup>lt;sup>26</sup>葉國良:〈八股文的淵源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6期(1994年6月),頁56-57。

<sup>28</sup> 同前註。

磨難天下才人,無如八股一道。太淺則浮,過深則晦。少一分才氣,則實義不出;多用一分才氣,則神貌有傷。工夫少間,即粗;拘守成說,則死。以故,極天下聰明才智之士,于詩賦雜藝,可從游歷酬應中著述,而八股非窮年閉戶,必不能涉筆成一字。<sup>29</sup>

戴名世(1653-1713)亦云:

今之經義,則代聖人賢人之語氣而為之摹擬,其語脈之承接於題之上下文義,皆各有所避忌,蓋其法律極嚴以密,一毫髮之有差,則遂至於猖狂凌犯,斷筋絕臏,而其去題也遠矣。30

江國霖(…1859…)云:制義「指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之博,持律如詩之嚴」。31言作制義需網羅多種文體的寫作能力。明顧錫疇(…1619-1645)云:「夫人孰無學,然有學而不得騁者,拘於制也,此制義之所以獨難於諸體。諸體能困人之無才無學,而制義獨困人之才與學也。」32由於有種種的避忌、限制的束縛,縱有才學也不得馳騁。後來爲防擬題及易於甄別,題目愈加刁鑽的小題盛行,爲之尤難上加難,康有爲(1858-1927)自言:「丱角學文,于小題搭截,尤畏苦之,其文法嚴苛,過于鉗網,觸處皆犯,束書不讀,稍能習熟,若復涉羣書,置而不事,即復犯文法,故六應童試,見擯以此。」33由康氏感嘆文法嚴苛,觸處皆犯,稍不習即又復犯,可知八股文法之細密。今人張中行(1909-2006)亦指出:八股規範最嚴格,更甚詩詞,也最難作。它集中了漢文學幾乎所有的形式技巧,是技巧性最強的體裁。34

 $^{29}$  〔清〕伍涵芬:〈論文〉,《讀書樂趣》(《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卷  $^{6}$ ,頁  $^{32}$ 。

<sup>30 [</sup>清]戴名世:〈小學論選序〉,[清]戴名世撰,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9月),卷4,頁91。

 $<sup>^{31}</sup>$  〔清〕江國霖:〈序〉,〔清〕梁章鉅著,陳居淵點校:《制義叢話》(上海:上海書店,2001年 12月),卷前,頁 5。後署:「咸豐九年」。

<sup>32 [</sup>明]顧錫疇:〈國朝制義序〉,收入於[明]鄭元勳輯:《媚幽閣文娛二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刻本),卷2,頁21。

<sup>33 [</sup>清]康有爲:〈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戊戌奏稿》(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3輯影印辛亥[1911]刊本),頁6。

<sup>&</sup>lt;sup>34</sup>張中行:《閑話八股文》(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 9 月 ),頁 3、75。

民初周作人雖主張大學應大講八股,但又感慨講授者的「人選困難」,因爲「精通八股的人現在已經不大多了」。<sup>35</sup>光緒末年的探花商衍鎏是身歷科舉、鑽研過八股的,自然懂得八股寫作的種種竅門,然曰:「今日而欲條分縷析,將八股文之篇法、股法、句法、字法、鍊句、修詞,種種而詳說之,萬語千言不能發其秘,窮年累月不能究其源。」<sup>36</sup>感嘆八股之道的深奧,大有輪扁斲輪,無從指授之意。今日,老成凋零,「精通八股」者不可得,張中行云:「八股已成爲絕學,沒人肯講,甚至沒有人能講。」<sup>37</sup>由是之故,八股文雖行於明清、廢於清末,時代看似晚近,然其與今人的距離,比其它漢賦、唐詩、宋詞等文體都要遠,亦無怪乎今人領略八股文,大都只能得其皮毛,不能深入其中。八股之難,形成今人研究的障礙,連涉及八股文研究的吳承學教授都坦承:「近年我從事古代文體史的研究,也花點時間讀些八股文,但至今仍覺霧裡看花。」<sup>38</sup>

文體之難如此,而又無精通之人講授、指引,使今人在研究時難以入門,只能「霧裡看花」,對評價八股的優劣,幾近無能爲力。

所謂「文無定評」,怎樣的時文爲佳?古人觀點常不一致;論文佳不佳,意見或相左;論中與不中,常歸諸於命。霍韜(1487 - 1540)任主考出,人問:場中好尙何如?霍韜答:「尙命,命好而文好,應有收好文者;命好而文歪,應有收歪文者,命歪者反是。」<sup>39</sup>張廷玉(1672 - 1755)任主考時,亦云場中「取舍殊而得失異者,蓋有數焉不可強也」,勉考生要安命。<sup>40</sup>連考官都以爲是命、有數,莫怪歸有光(1506 - 1571)言道:「科舉自來皆撞著,必無穿楊貫蝨之技。」

戴名世言時文選家優遊論定,取捨尚且彼此不同,何况是刻日峻事的主司! 同一文而易主司,取捨甲乙心大相徑庭,<sup>42</sup>故言科場,「其得之者,未必其文之

<sup>36</sup>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頁 228。商氏爲光緒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探花。

<sup>&</sup>lt;sup>35</sup>周作人:〈論八股文〉,《看雲集》,頁 144。

<sup>&</sup>lt;sup>37</sup>張中行:〈《說八股》補微〉,收入於《說八股》,頁73

<sup>38</sup> 吳承學等:〈一個期待關注的學術領域 - - 明清詩文研究三人談〉、《文學遺產》1994 年第 4 期, 頁 5。

<sup>39 [</sup>明] 唐時:〈與袁州平〉引述,收入於[清] 周亮工評選:《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四庫禁 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賴古堂刻本),卷7,頁28-29。

<sup>40 [</sup>清]張廷玉:〈甲辰科會試錄序〉,收入於[清]陳廷敬等奉敕編:《皇清文穎》(《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卷17,頁5。

<sup>&</sup>lt;sup>41</sup>〔明〕歸有光:〈與沈敬甫〉,〔明〕歸有光撰,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臺北:源流出版社,1983年4月),〈別集〉,卷7,頁864。

<sup>42 [</sup>清] 戴名世:〈庚辰會試墨卷序〉、《戴名世集》、卷4、頁97。

皆工也;其不得者,亦未必其文之果不工也」。<sup>43</sup>晚明王錫爵(1534 - 1610)、王 衡(1564 - 1607)之八股皆享譽當時,而父子評文卻相左,沈德符(1578 - 1624) 《萬曆野獲編》中有生動的記載,並評:「文字一道,家庭間,意見迥別若此, 況朋友乎!」<sup>44</sup>清末路德(1784 - 1851)自省:「頗多看過之文,曩日濃圈密點, 今竟有礙難圈點之處,不是眼界過高,只緣訓士多年,於此中得失歷久漸明。即 自家從前得意之作,今亦疵累百出,老去漸於詩律細,故所見率多不合。」<sup>45</sup>然 此猶有時間差的因素,造成今昔對文章評價之異,晚明唐時更認爲,同一主司在 閱卷評文時,再次「取所閱之卷而重閱之,其取舍又當不一也」。<sup>46</sup>中與不中間, 雖有關係文章之處,但更多是無法掌控的因素。

何謂佳作?在古人已難獲得一致的共識,今人更難置喙。八股文文法細密,今人本就難以窺其堂奧,加上時文尙新變,使吾人評論時文,更難措手。李漁(1611-1679)言時文「妙在聞所未聞,見所未見」,<sup>47</sup>時文特重求新、求變,每科面貌不同,湯賓尹(1568-1628後)云:「制舉之業日新月敝,自吾所耳目名噪一時,踰三年無不棄者。」<sup>48</sup>顧炎武云:「時文之出,每科一變。」<sup>49</sup>謝肇淛(1549-1613)甚至說制義「日異歲更,朝令之而夕不以爲然矣」。<sup>50</sup>所以,陸世儀(1611-1672)強調學習時文雖要取法先正,但也必須「下襲時彥」,因儘管「成、弘之簡朴,嘉、隆之渾灝,易時而試,則皆不售矣」。<sup>51</sup>許汝霖(…1682…)亦言:「時文由來屢變,即使述瞿、薛鴻篇于今日,錄金、陳傑作於異時,以此期拾甲與收科,未必如探囊而取物。」<sup>52</sup>李維楨(1547-1626)任陝西學政,特別提到坊間

12

<sup>43 [</sup>清] 戴名世:〈李潮進稿序〉、《戴名世集》,卷4,頁105。

<sup>&</sup>lt;sup>44</sup> 〔明〕沈德符:〈癸未丙戌會元〉,《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0 月 ),卷 16, 頁 416 - 417。

<sup>45 [</sup>清]路德:〈復及門奎石甫書〉,《檉華館全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七年[1881]解梁刻本),卷3,頁38-39。

<sup>46 [</sup>明] 唐時:〈與袁州平〉,收入於[清] 周亮工評選:《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7,頁29。 47 [清] 李漁:〈演習部・變調〉,《李笠翁曲話》(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筆記三編》本), 更28。

<sup>&</sup>lt;sup>48</sup> [明]湯賓尹:〈王季重松龕稿序〉,《睡庵稿》(《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萬曆刻本),卷 4, 頁 1 - 2。

<sup>&</sup>lt;sup>49</sup>[清]顧炎武:〈生員論中〉,《顧亭林詩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3月), 《亭林文集》,卷1,頁23。

 $<sup>^{50}</sup>$  [明]謝肇淛:〈金積園社草序〉,《小草齋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天啓刻本),卷 5,頁 12。

<sup>51 [</sup>清]陸世儀:《思辨錄輯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頁8。

<sup>52 [</sup>清]許汝霖:〈禁翻刻舊稿〉,《德星堂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刻本),卷9,頁3。瞿、薛、金、陳,分指:瞿景淳、薛應旂、金正希、陳際泰等時文名家。

科舉用書、時文選本之誤人:「陝在西隅,書販來遲,但聞舉業時文,爭購做襲,不知此中之新樣已是彼處之陳言,兀兀窮年,空勞心力。」<sup>53</sup>以上諸人所論,都指出不同時期,好尙有異,時文何者爲佳,必須置於當時時空來評價。位處邊陲的陝西一帶,因掌握不到最新的訊息吃虧,今日時空俱變,更乏訊息,加上時文日新月異、推陳出新之迅速讓吾人更難以追溯當時的好尙,無從辨識何爲「新樣」?何爲「陳言」?

而何者爲創?何者爲襲?吾人亦無從掌握。王思任(1576 - 1646)〈悔謔〉記:

一秀才專記舊文,試出果佳,誇示謔菴,定當第一。謔菴曰:「還是第半。」 秀才不喻,謔菴曰:「那一半是別人的。」<sup>54</sup>

王思任因爲熟悉當下流行、考生口能成誦的舊文,所以看得出是「第半」,我們 卻絕對看不出。許多攸關著中與不中的科舉訊息,當時考生心知肚明的,文獻中 卻不見得有留下線索、痕跡。如不同時期、地區的風氣、不同主考所賞,當時的 考生知道,後人卻覺模糊、無從摸索。

以考官而言,試前學子爭相打聽考官所好、閱讀其舊作、選文,以爲揣摩捷徑。錢澧(1740-1795)云:「使者按試數郡,例檢試文佳者數首刻之,不沒作者之善也,於是應試生童亦爭先覩以爲快,將以覘使者之所好而爲揣摩之術也。」錢澧以爲如此「徇使者之好」的作法,有違聖賢之道。55許汝霖任學政主持院試時,發現書坊擅刻其文射利:「坊賈鬼蜮多端,忽假西冷彙賢齋西爽堂舊坊名色,擅刻學院許太史已未刻稿,封面併印『學院頒行』圖記,營財射利,炫惑生童,深可痛恨,合行嚴禁。」56許氏有感於學生揣摩抄襲之嚴重,爲了矯枉,甚至自貶其文:「本院鄉、會兩稿,氣局粗笨,字句庸熟,在當年已成數見,迄今日更所厭聞,若再襲一語,斷然不錄。」57於此可見考生多麼極力追隨、揣摩考官的作品風格、投其所好。休論有違聖賢之訓,能不能考上,才是考生最關心的。

以區域而言,董其昌(1555-1636)言當時:「方內制義各有偏至,吳以韻

<sup>53[</sup>明]李維楨:〈陝西學政〉,《大泌山房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刻本),卷134,頁4。

<sup>54 [</sup>明]王思任:〈悔謔〉,《謔菴文飯小品》(《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順治十五年[1658]王鼎起刻本),卷 2,頁 91。

<sup>55 [</sup>清] 錢澧:〈湖南試牘序〉,《錢南園遺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同治十一年[1872] 劉 崐長沙刻本),卷 4,頁 21。

<sup>56 [</sup>清]許汝霖:〈禁翻刻舊稿〉,《德星堂文集》,卷9,頁3。

<sup>57 [</sup>清]許汝霖:〈申明文體〉、《德星堂文集》、卷9、頁20。

致,越以色澤,楚以才情,閩以結搆,中州以蘊藉。」<sup>58</sup>姚希孟(1575?-1632?)言當時吳地的「投時善物」爲「輕揚婉麗,又或綿其詞、揉其骨,以蘄入於人心」者。<sup>59</sup>陶望齡(1562-1589···)云:「今時經生之文,莫尚于吳、閩。閩以奇麗,吳以風裁。四方文卷之行于市者,雖錯糅其簡,抹摋其姓氏,而爲閩與吳,要可以懸辨。」<sup>60</sup>觀陶氏「可以懸辨」講得斬釘截鐵,可知長期浸淫於時文所培養出的靈敏嗅覺、眼力--這是吾人無法企及的。誠如張中行所云:要辨識各流派、名家時文其間風格的出入、差別,今人「沒那個本事」。<sup>61</sup>對於上述三人對吳地時文的形容:「韻致」、「輕揚婉麗」、「風裁」其間的異同,我們也難以分辨。張英(1637-1708)云:「當知棘闈之文與窗稿房行書不同處。南闈之文又與他省不同處,此則可以意會,難以言傳。惟平心下氣細看南闈墨卷,將自得之。」<sup>62</sup>倘若處在當下,其間的差別都難以言傳,今日我們縱使取得了當時南闈應天府的試錄、墨卷,也難以看出、道出與他省間細微的差異。

#### 四、 文獻牽涉廣泛,遺佚嚴重

文獻難以掌握,乃因:一、科舉文獻涉及面廣,涉獵、涵蓋相關知識頗爲吃力。二、向來不重保存科舉文獻,加上時文求新尚變,過時即廢,文獻湮滅的情形嚴重。三、時文文本真僞淆雜,今人解讀、評價不易。

劉海峰教授指出,狹義的「科舉文獻」,指登科記、題名錄、登科錄、同年 齒錄、同年小錄、科第錄、科齒錄、科名錄、題名碑錄、闡墨、硃卷、科舉試卷, 還包括專門的八股文、試帖詩選本和專門記載或研究科舉的著作,以及備考的書 籍。廣義的「科舉文獻」,除上所述,還包括專門記載科舉的歷史檔案,散見於 各科書籍中的科舉試題和試卷,各種文集、地方志、類書、筆記、小說、戲曲等 所有各類文獻中關於科舉的記載。<sup>63</sup>可謂包羅眾多,誠如鄧嗣禹(1905 - 1988) 所言:「中國載籍,言及考試者,幾於無書無之。」<sup>64</sup>八股文的研究並非單純的 文體、文學研究,與明清教育、科舉興革密切相關。以上所羅列之科舉文獻,也

13

-

<sup>58 [</sup>明]董其昌:〈方旦心平平草題詞〉,《容臺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年7月,影印明崇禎三年[1630]原刻本),卷3,頁56。

<sup>59 [</sup>明]姚希孟:〈沈去疑稿序〉,《響玉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張叔籟等刻《清閟全集》本),卷 10,頁 44。

 $<sup>^{60}</sup>$  [明] 陶望齡:〈王慕蓼制義序〉,《陶文簡公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天啓陶履中刻本),卷 4 , 頁 11 。

<sup>&</sup>lt;sup>61</sup>張中行:《閑話八股文》(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頁58。

<sup>62 [</sup>清]張英:〈聰訓齋語〉,《文端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6,頁 16 - 17。

<sup>&</sup>lt;sup>63</sup>劉海峰:〈科舉文獻與「科舉學」〉,《臺大歷史學報》第 32 期 ( 2003 年 12 月 ),頁 279。

<sup>&</sup>lt;sup>64</sup>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1月),頁387,〈參考書目〉後注。

常是八股文研究所需旁涉,然其涵蓋面之廣,遼闊如海,這是研究八股建立基礎 知識吃力之處。

相關的制度不但瑣碎,也常因流弊而時作修正,頗難全面掌握。如陳康祺 (1840-1871後)在《郎潛紀聞四筆》中,曾歷述清以來鄉、會試「副榜」之 制的變更,不勝瑣碎,結尾云:「此亦科舉掌故之一,時代未遙,規制屢改,恐 今之身爲副榜,昧厥淵源者多多也,故詳述之。」65舉此可知,規制屢改,連當 時身爲副榜者多不知,吾人生於今日,更難考察其來龍去脈,也難以掌握制度的 興革、實施情形。且制度與實際實施間,又頗有落差,竟使得吾人不能太過於相 信白紙黑字的功令規定。

以字數而言,晚明陳龍正(1585-1645)云:功令規定「初塲限字五百之制, 累科申飭,全不遵行」。66清康熙二十年(1681)議准,八股文「限六百五十字, 如違限例謄錄取中,照例議處」。67限字規定,考生、考官何嘗不知?但是否恪 遵又是另一回事。康熙四十五年(1706)會試,考官原來所取的會元尙居易,首 篇竟多達一千二百餘字。<sup>68</sup>筆者曾考察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的現象,發現文 獻中,不時有強調三場均重、呼籲重後場的剴切諫言、詔諭,而截至清末,重首 場的現象依然如故。<sup>69</sup>又如明中葉後,朝野屢屢強調八股代聖立言,不得濫入佛 老、異說,然李樂(1532 左右 - 1601 後)云:

今日試院,先生出示必言:「舉子文字如用佛經、老莊語者不取。」據余 目見中式文甚少,然何嘗無佛語、老莊家言。至序文必言:「平正通達, 務點奇詭。」然奇詭至不能解讀者中式甚多。故天下文體大壞,皆所好、 所今自相違悖致之也。<sup>70</sup>

行與言違、所取與功令違,制度與實施間的出入、落差,似頗爲常見。<sup>71</sup>如清代

<sup>65 「</sup>清〕陳康祺:〈鄉試副榜充貢定例〉,〔清〕陳康祺撰,張文玲點校:《郎潛紀聞四筆》(北京: 中華書局,1984年3月),卷2,頁25。

<sup>66 [</sup>明]陳龍正:〈科場事宜題稿〉,《幾亭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雲書閣刻本), 卷40,頁17。篇題下原注:「壬午代林大宗伯」。

<sup>67 [</sup>清]素爾訥等撰:《欽定學政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武英殿 刻本), 卷6, 頁2, 〈釐正文體〉。

<sup>&</sup>lt;sup>68</sup>「清〕俞正燮:〈八股文舊事〉,《癸巳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 卷12,頁372。此事後經陳廷敬參奏,以違例而遭黜革。

<sup>69</sup>參拙作:〈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

<sup>&</sup>lt;sup>70</sup>〔明〕李樂:《見聞雜記》(臺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 年 9 月 ),卷 9,頁 75 - 76,第 89 則。

論八股典型,朝野屢屢強調、一致推崇「清真雅正」,然若斷然以爲「清真雅正」是撰文的圭臬、衡文的不二標準,恐遠離實情。<sup>72</sup> 俞樾(1821 - 1906)曾云:「國家以《四書》文取士,懸『清真雅正』以爲鵠,士之從事於此者,貌爲清真,實則淺薄;貌爲雅正,實則凡庸,而時文遂爲世詬病,非得奇奇怪怪之文,不能振而起之。」<sup>73</sup>因奇奇怪怪之文仍爲考生所流連、考官所青睞,制義求新尚變的發展,造成考官、考生的脫序,偏離了應制文字當「清真雅正」的原則。正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時文因爭勝炫奇而流於奇詭,這正是朝廷要常常呼籲「清真雅正」以矯枉的原因。

科舉文獻涵蓋面廣,留存的固然不少,而遺佚的更多。特別是光緒末年廢止 八股取士後,「時文則從此廢棄無所用之,坊間所刊所印之大題、小題《文府》、 《文海》、《文選》、《文抄》皆一槩頓成棄物矣,此等書冊,浩如煙海,何止汗牛 充棟!」<sup>74</sup>八股文獻由充斥市面、家有其書,而在瞬間湮滅殆盡。商衍鎏亦言: 時文選集,「自明至清,汗牛充棟之文,不可以數計。但藏書家不重,目錄學不 講,圖書館不收,停科舉廢八股後,零落散失,覆瓿燒薪,將來欲求如策論詩賦 之尚存留於世間,入於學者之口,恐不可得矣。」<sup>75</sup>

關於商氏所云「目錄學不講」,歷來書目確實不重科舉用書,單獨將科舉用書獨立歸作一類的不多見,僅偶或零散的散見於各類之中。<sup>76</sup>《四庫全書總目》批評黃虞稷(1629 - 1691)《千頃堂書目》「『制舉』一門可以不立」,原因是:「明以八比取士,工是技者,隸首不能窮其數,即一日之中,伸紙搦管而作者,不知其幾億萬篇;其不久而化爲故紙敗燼者,又不知其幾億萬篇。其生其滅,如煙雲

<sup>71</sup>如鍾毓龍曾描述清末許多科舉制度,形同具文,有規定而不見實行者;有已扭曲其原貌、失立制之本意者。參鍾毓龍:《科場回憶錄》,收入於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文史資料精選》(1)(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7月),頁294-329。

<sup>72</sup>高明揚、蔣金星:〈清代文化政策對八股文衡文標準的影響〉,《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2005年第4期(2005年7月),頁482云:「在清代科舉考試中,主考官閱卷正是依據『清真雅 正』這一標準來判定文章的等第。」

 $<sup>^{73}</sup>$  [清] 俞樾:〈胡稚威先生《餘吷錄》序〉,《春在堂雜文》(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42 輯,1969 年影印清末刻本),第四編,卷 6,頁 11。俞樾將《餘吷錄》喻爲「時文中之樊宗師」,可見風氣之一斑。

 $<sup>^{74}</sup>$  [清] 闕名:〈論廢時文尤當除積弊〉,收入於〔清〕金匱闕鑄補齋編輯:《皇朝新政文編》(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30 輯,影印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中西譯書會印本),卷 3,〈科舉〉,頁 5 - 6。

<sup>&</sup>lt;sup>75</sup>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頁 227 - 228。

<sup>&</sup>lt;sup>76</sup>參周彥文:〈論歷代書目中的制舉類書籍〉,《中國書目季刊》第 31 卷第 1 期 (1997 年 6 月), 頁 1 - 13。

之變現,泡沫之聚散。」<sup>77</sup>因爲科舉書籍太泛濫了,徒據所見,掛一漏萬,收不勝收。大雅又以爲缺乏價值,所以,歷來書目不重科舉書籍,《總目》所錄亦頗 掛擇。

明清諸人文集,收錄論、表、策問等科舉文體者,還頗爲習見,但卻以不收 八股文爲常態。所謂「文集附時藝,近今罕有」<sup>78</sup>,乾隆四十年(1775)上諭曰:

時文為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止可聽其另集專行, 不宜並登文集。 <sup>79</sup>

文集不收八股,在明代就已是約定俗成的共識,如瞿景淳(1507 - 1569),其時文與王鏊(1450 - 1524)、唐順之(1507 - 1560)、薛應旂(1500 - 1573)齊名,合稱「王唐瞿薛」,然其《制科集》卻只收策、論,不收時文。<sup>80</sup>歸有光公認爲明清首屈一指的時文名家,歸氏文集有「應制論」、「應制策」,但未收任何一篇八股文。<sup>81</sup>支大綸(1534 - 1604)文集收論、表、策,卻未收八股。<sup>82</sup>此皆可見,其它科舉文體常被收入文集中,而八股卻被排除在文集之外。明代是如此,至清末猶有「近代通例,別集不收時文」<sup>83</sup>的慣例,可見時文不登文集,爲明、清兩代絕大多數的文集編纂者一致的堅持。

 $<sup>^{77}</sup>$  [清] 紀昀奉敕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 1 月),卷 85,頁 19,〈千頃堂書目〉條。

<sup>&</sup>lt;sup>78</sup> [清]洪若皐受業弟子輯:〈凡例〉,[清]洪若皐:《南沙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刻本),卷前,頁7。

 $<sup>^{79}</sup>$  [清] 王先謙:《東華續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十年 [1884] 王氏刻 本),〈乾隆八十二〉,頁 31。

<sup>&</sup>lt;sup>80</sup>〔明〕瞿景淳:《制科集》,收入於《瞿文懿公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瞿汝稷刻本),卷 1、2 收策,卷 3、4 收論。

<sup>81</sup>鄧雲鄉:〈八股文三問〉,《水流雲在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3月),頁328;以及戴華萱:《崑山歸有光研究--明代地方型文人的初步考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6月,黃明理先生指導),頁167。皆誤以爲歸集所錄〈乞醯〉爲八股文,〈乞醯〉文見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別集〉,卷1,頁713-715。其類別明標爲「應制論」,其文亦非制義體裁。

<sup>82 〔</sup>明〕支大綸:《支華平先生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清旦閣刻本)。卷 19 - 21 收所作論、表、策。

<sup>&</sup>lt;sup>83</sup>按:此爲清道光九年(1829)陸錫智爲嚴可均選一卷時文所作卷前識語,見〔清〕嚴可均:《鐵橋漫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十八年〔1838〕四錄堂刻本),卷 13,頁 1。

不僅是時文,連時文序也因多阿諛之詞,被視爲應酬之作,<sup>84</sup>因此不受名流、大雅認可,文集大多不收。王芑孫(1755 - 1817)云:「時文序入集,誠自可厭,近流中頗有言時文序不必作、不必存者。」<sup>85</sup>謝章鋌(…1877 - 1895 前後在世) 認爲時文序「不足珍」、「雖佳勿錄」。<sup>86</sup>這顯然是不少人共同的主張,如王步青(1672 - 1751)子王士鼇爲其編文集,亦僅存所作時文序十之一二而已。<sup>87</sup>

依筆者觀察,晚明文集收時文序較爲泛濫,常見數十篇、多達數卷之量,<sup>88</sup> 謝章鋌還特別強調,對明末文家好存時文序至於盈卷,頗不以爲然。<sup>89</sup>而在清代,愛惜羽毛的大雅之士,對於文集收時文序更爲保留,錢澄之(1612 - 1694)文集收〈徐方虎制藝引〉,文後自註云:「制藝序多不錄」,收此文爲特例。<sup>90</sup>如袁枚(1716 - 1798)文集收〈胡勿●時文序〉,文後,袁氏自註:「集中不存壽序及時文序」,此篇乃「破例而存之」。<sup>91</sup>士子常拿自作的時文,委託名人品評,固有「求教」的成份在,而主要目的大都是爲得到這些名人的推重、背書,以自抬身價。因此,在社會上聲望愈高、影響愈大,或有名的時文大家、評選者等,受託寫時文序的情形更爲常見,如方苞(1668 - 1749)就飽受「以時文來屬者多,力有不給」的困擾,「數月中所作至十餘篇,……其許而未及爲者尙倍之,而謝不爲者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3月),卷2,頁36-38。

<sup>85 [</sup>清]法式善:〈曹景堂制藝序〉,《存素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二年[1807] 程邦瑞揚州刻增修本),卷3,頁1。參此文後附王芑孫(惕甫)評語。

<sup>86 [</sup>清]謝章鋌:《賭棋山莊筆記·圍爐瑣憶一》(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影印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刊本)。

<sup>87 [</sup>清]王步青:《巳山先生別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乾隆敦復堂刻本),卷前,〈目錄〉,頁4,王步青子王士鼇識語:「若時文序、壽序、家傳僅存十之一二,非其人足存,即其論可存者也。自餘應酬牽率之作,槩不收入。」

<sup>88 [</sup>明]李光縉:《景壁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4月影印明崇禎十年[1637]刊本),卷7全為制義序,共六十餘篇。[明]湯賓尹:《睡庵稿》,卷3-6;[明]陳名夏:《石雲居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影印清順治三年[1646]刻本),卷1-3。皆為制義序。
89 [清]謝章鋌:《賭棋山莊筆記・圍爐瑣憶一》(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影印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刊本)。

<sup>90 [</sup>清] 錢澄之:〈徐方虎制藝引〉,《田間文集》(合肥: 黄山書社,1998 年 8 月),卷 16,頁 313 - 314。

<sup>91 〔</sup>清〕袁枚:〈胡勿●時文序〉,〔清〕袁枚撰,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小倉山房續文集》,卷28,頁1771-1772。

不可勝數也」。<sup>92</sup>今所見《方苞集》收錄時文序,亦不過十三篇而已,<sup>93</sup>以方苞之 名聲,可以想見所作時文序當遠不止於此。

文集不收時文,連時文序也難登文集,這些都是時文文獻大量失落的原因, 也使今人追踪時少了許多線索。

#### 五、 文獻真僞淆雜,作家風格難以考察

時文善變已如前言,選本與時俱出,也旋因過時而被棄置,「新科利器」方 足爲貴。武叔卿言:時文之「機局格調,亦必隨時變更。如高髻窄袖,昔爲美粧, 今爲陃飾,若不逐時改樣,則駭然怪物矣。故時文者,時所尚也,鳥得不措意乎! 故每科程墨出,須一一熟讀。」。田雯(1635-1704)亦云:「一科之房書甫出, 而前科之文已束高閣;一學使之試卷初頒,而前使者之文等諸唾涕。」<sup>95</sup>此皆可 證時文推陳出新之迅速,所以除非是極有名的大家、名選,否則在時間的洪流中, 幾年間很快就遭到淘汰、湮滅了,不必等到清末廢科舉、時文選本歸於無用時。 時文的善變,是許多時文選本不能傳世的重要原因,如陳際泰,是出名的時文大 家、文思敏捷的快筆,戴名世言陳氏「日數十藝而不竭」,96《明史》言其爲文 「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後所作至萬首,經生舉業之富,無若際泰者」。<sup>97</sup>異口同 聲指出陳氏之多產,今日我們常見到的,大概就是呂留良(1629-1683)所選評, <sup>%</sup>及方苞《欽定四書文》等選本所錄,不過百餘首而已,相對於陳際泰一生產量 之多,可以掌握的文本實在太少。遑論其它時文名氣、成就遠不如陳際泰者,其 時文可能連一篇都不曾傳到今日。

文經選評、圈點, 造成文本的改變, 昔人嘗言此已非原著, 可說是評選者的 作品。<sup>99</sup>後人所能見到的時文,大都是經由選家從成千上萬篇的時文中,篩選、

<sup>92 「</sup>清〕方苞:〈與吳東巖書〉、〈與熊藝成書〉,〔清〕方苞撰,劉季高點校:《方苞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集外文》,卷5,頁657-658。

<sup>93</sup>收錄於《方苞集》,卷4;《集外文》,卷4。

<sup>94〔</sup>明〕武叔卿:《舉業巵言》(清道光十五年〔1835〕朝邑劉氏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 圖書館藏),卷下,頁27。

 $<sup>^{95}</sup>$  「清〕田雯:《古歡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7,頁 15,〈學政條約〉第七則。 96 「清〕戴名世:〈陳大士稿序〉,《戴名世集》,卷4,頁 104。

<sup>&</sup>lt;sup>97</sup>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288,頁 7403。

<sup>98 〔</sup>明〕陳際泰撰,〔清〕呂留良輯評:《陳大十先生稿》(清康熙天蓋樓刊本,臺北:中央研究 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sup>&</sup>lt;sup>99</sup> 筆者在〈明清士人對「評點」的批評〉,《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4 卷第 3 期 ( 2004 年 9 月 ), 頁 239 - 240,〈評點將導致文本改變〉一小節中,曾論述由於評點造成文本的改變,故前人言文

圈評而後留存的,這些文本,代表的到底是呂留良、方苞等評選者時文品味的體現,還是陳際泰等作者的本色風格?殊堪質疑。這個普遍存在的疑慮,也是研究歷代時文名家作品,所需思考的問題。

再者,歷來許多別集的刊刻,其動機大都是爲存一家之言,是「作者」傾向的。而坊間銷售的時文評選,則多爲功利目的,是爲「讀者」服務的,凡可增進考生時文寫作能力,能幫助他們得意考場,就是暢銷的科舉用書。本來評選者對所選的文本,就常有改易、刪節之舉,因此屢爲大雅所垢病。<sup>100</sup>而時文選本既是「讀者」傾向的,且時文的標準、好尙因時而異,選家因時修正、改易作者原著,也就更理所當然、肆無忌憚了。如清人屢言時文寫作忌「合掌」,趙吉士(1628-1706)云:「兩比而止一意,名爲合掌」,言此爲「文家之大病也」。<sup>101</sup>李紱(1673-1750)云:「時文最忌合掌。……夫八股猶散文耳,假令作散行文字,每段重說一遍,豈成文理?正、嘉以前風氣未開,能事未盡,股意不清,往往有之,以此爲極至,陋矣!」<sup>102</sup>合掌既已成爲時文寫作之忌諱,如遇正、嘉以前作品犯了合掌之病者,選家修改以求盡善,以避免誤導初學,立場似乎理直氣壯。

呂留良對「坊選好竄改刪割人文字」,頗不以爲然,以爲施諸時人猶可,污及先輩不該,「先輩之紕繆,但當批乙,不當刪改。批乙,則古之得失與吾之是非,皆可共見。雖摘駁前賢,而不敢自是之意固在也,刪改則誣妄矣。」<sup>103</sup>呂氏選評《十二科程墨觀略》,人問:「何以大、小題不用直抹,而此獨見之?」答曰:「大、小題,房書也。房書無定本,其大段不佳者,去之可也;字句小疵者,更之可也。若程墨則一成而不可易,且士人所取,則故不得不直。」<sup>104</sup>呂氏門下力行堂諸子言:

經評選已成「私書」、如己作,雖選的是古人作品,卻如自著一書。張溥嘗言張采所選的房書,「統部觀之,直受先書耳」,亦是此意。〔明〕張溥:〈房書藝志序〉,《七錄齋詩文合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崇禎九年〔1636〕刻本),〈近稿〉,卷1,頁30。

100參筆者:〈明清士人對「評點」的批評〉,頁 238 - 239,〈評點本常有改易、刪節之舉〉一小節。 101 〔清〕趙吉士:〈萬青閣文訓〉,《萬青閣全集·萬青閣制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 熙趙繼抃等刻本),頁 187。

102 [清]李紱:〈秋山論文四十則〉,《穆堂別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十一年[1831] 奉國堂刻本),卷 44,頁 10。

<sup>103</sup> [清] 呂留良:《呂晚邨先生論文彙鈔》(《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 呂氏家塾刻本),不分卷,頁 65-66。

104 [清] 呂留良:《十二科程墨觀略》(清順治二年〔1646〕至康熙十二年〔1673〕呂氏天蓋樓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前,〈凡例〉,頁1。「程」即「程文」,是主考官所作之範文;「墨」即「墨卷」,是士子在科場上所作的應試文,合稱「程墨」。「房書」又稱「房稿」,是進士平日所作之八股文。

比來佳文,每為白腹選家刪改壞盡,如集中〈魯無君子者〉,尹君明廷作, 從坊本登板,已而友人以原本來較,則竄抹甚多,若提比有云:「交遊日 習,在樂羣者,亦自忘為我生之幸矣。行誼既成,在考道者,亦不知為誰 氏之益矣。」數語極有意思,而橫遭劣傖腳迹點金成鐵,真文章大劫,集 中不知凡幾,惜不及一一訂正,識者肯惠教之,異日改刻,亦一快事也。

據上面引文所言:佳文被刪改壞盡、點金成鐵,爲文章大劫、不知凡幾云云,可知選家刪改前人的八股文,乃爲普遍常見的現象。如呂留良等如此尊重作者的,已屬難得。然細審其言,對於古人之作、程墨,較爲謹慎,對於今人之作、房書,仍以爲選家可以刪修。方苞編《欽定四書文》,其〈凡例〉云:

前人流傳名篇,間有字句率易,義理或未妥者。向來各家選本多有節刪、 互異之處,今擇其猶當者從之。其未經諸選摘發而稍加改易者,亦間有之。 106

從「各家選本多有節刪、互異之處」,可知選家改易現象之常見,而方苞所編,亦不免有「稍加改易者」。如唐彪(1644?-?)云:「小題最難得佳,雖大名公之作,亦不能無弊病,必改去之,使歸盡善,讀之方益制藝。非聖經賢傳,改何嫌於僭乎?」<sup>107</sup>路德時文選本風靡晚清,爲編纂教材嘗遍閱小題,或因舊文有疵,或因難以學步,爲使所編教材適用,路德對既有的舊文,「擇可改者改之」。<sup>108</sup>

縱使是時文名家,其文集中亦不收八股文,個別的時文專集又容易因過時湮滅,難以傳世,所以吾人大都只能透過後來傳世的時文選本來認識過往的時文名家。無奈的是:時文選本是爲考生、考試服務的,而不重保留、還原作品的原貌,所以當我們透過選本所錄,來認識、評價時文作者時,可能是不太確切的 - - 那裡不確切?在沒有可以作爲校勘文本出現的情況下,誰也說不上來。時文選本如此,鄉、會試錄亦然。大凡鄉、會試錄所錄,主考爲了避免貽笑方家,並考慮作爲士子習文的典範,不可不慎重,對墨卷大多會加以潤飾、修改,甚至有代作的。明中葉後至晚明,不時有人呼籲:考官官專心校閱,試錄之文官取生儒原卷修潤,

20

<sup>105 [</sup>清]力行堂諸子同識:〈凡例〉,[清]呂留良:《天蓋樓偶評--小題觀略》(清康熙十二年 [1673]石門呂氏天蓋樓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卷前,頁3。

<sup>106 [</sup>清]方苞:〈欽定四書文凡例〉、《欽定四書文》、卷前,頁5。

<sup>107 [</sup>清] 唐彪:《父師善誘法》(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11月), 卷下,頁34。

<sup>&</sup>lt;sup>108</sup> [清] 路德:〈仁在堂時藝引序〉,《檉華館全集》,卷 2,頁 62 - 64。

不可親撰,以妨考校云云。<sup>109</sup>修潤已非原貌,代作更全非本來。至於刻意作僞、假託姓名者,亦所在多有,呂留良門下力行堂諸子又言:「小題選本向多假托姓名,移甲換乙,不可究詰。」<sup>110</sup>如許汝霖云:

臣考明代制科之初,專刻程墨,並無坊選,……沿至明季,遂有房行,始於會試同考,盛於一二名家,要未有盡人操選,通篇俱偽者。自末學小生, 羣尚私刻元魁之墨、主考之評,竄改假捏,盡易本來,甚至有一榜數十人, 一稿數十藝,總非本人所自為者。<sup>111</sup>

言墨卷之文、考官之評皆爲僞作。張溥(1601-1641)自言已不再評選時文時,四方選役僞託其名以刊行者有十來本。<sup>112</sup>清初恩國泰等提議「禁社稿」,躁進鶩名之徒,結盟立社,「假以文會友之名,行奔競鑽營之私,倩雇代筆,集刻社稿」。<sup>113</sup>倩雇代筆,亦是作僞。姚鼐(1731-1815)又指出:「有不善文而倖第者,取諸生善文而身沒者之文,據爲己有,亦刻爲稿。」<sup>114</sup>這些時文真僞淆雜的情形,爲其它文體所罕見,也使今人在研究取材上,多了一層顧慮。

到底八股文有無個人風格、特色可言?當然有,尤其是時文名家,之所以能自名一家,當然有其別出心裁之處。如後人每言歸有光「以古文爲時文」;李光縉(1549-1623)評湯賓尹之作:「秀媚入人,但少丈夫豪傑之氣。」<sup>115</sup>王夫之

<sup>110 [</sup>清] 力行堂諸子同識:〈凡例〉,〔清] 呂留良:《天蓋樓偶評 - - 小題觀略》,卷前,頁 4。

<sup>111 [</sup>清]許汝霖:〈請禁私選假刻以端文教疏〉,《德星堂文集》,卷7,頁3。

<sup>112 「</sup>明〕張溥:〈房書藝志序〉、《七錄齋詩文合集》、〈沂稿〉、卷1、頁29。

<sup>113</sup>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恩國泰等:〈禮部尚書恩國泰敬陳學政之要事題本〉,收入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順治年間科舉題本選〉,《歷史檔案》1987年第3期(總第27期),頁24。
114 [清]姚鼐:〈徐六階時文序〉,[清]姚鼐撰,劉季高標校:《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卷4,頁59-60。

<sup>115 [</sup>明] 李光縉:〈昭代諸元折衷下〉,《景璧集》,卷7,頁7。

(1619-1692) 評黃淳耀 (1605-1645) 處在晚明內憂外患之際,其制義「憂憤 塡胸,一寓之經義,抒其忠悃」。<sup>116</sup>或者是清初尤侗 (1618-1704)、王廣心 (… 1649-1682…)的「尤王體」,淵源六朝、詞勝於意,體如庾、徐、溫、李。<sup>117</sup>這 都是各家在八股文領域中,獨特、自成一家的特色。

事實上,今人要認識、評價明清作者的時文,非常不容易。多虧飽覽各種制義的選家、古人,對上述時文名家各自樹立的風格,留有不少相關的評論,我們還可以循著這些蛛絲馬跡去追溯。更多數的時文作者,因爲前面所說的文獻湮滅、難以存真,再加上八股文體之難、時空改變造成的距離,讓今之學者,對於評價其八股,充滿無力感。

今人無眼力,只好倚賴前人之評論。然而選評者各有偏好,彼此牴牾;或因人情壓力、應酬之需,阿諛過揚,亦不可盡信。阮葵生(1727 - 1789)曾感慨選家所選,「只是一部搢紳便覽耳」。<sup>118</sup>選文不客觀,評文亦是,呂留良歎云:「士林廉恥之道,最是選家喪滅得盡,奔競諂阿,恬無愧怍,其品在儈乞之下,非士人所宜爲也。」<sup>119</sup>本來評點就常被用來互相標榜,<sup>120</sup>作爲學子習文教材的時文選,評選者必須辨其妍疵、道其得失,方爲有益。而文社集刻的社稿,「或傳播都門,或逢人報送,務必令己之名姓常在人耳目間,以爲他日關節行私之地」,<sup>121</sup>其目的在打知名度,社稿的選評者,必然是要「隱惡揚善」。個人的時文稿情況也相同,如徐光啓《詩經傳稿》爲徐氏子孫所刊刻,<sup>122</sup>收錄了徐光啓的九十三篇《詩經》八股文,其出版動機本出於對先人的緬懷與推尊,試問執筆評點的王光承(1606 - 1677)等人,怎能美惡並陳?是以對選家的評語,必須考量其語境,亦不能宣從。

\_

<sup>116 [</sup>清] 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第 18 條,《船山全書》(十五)(長沙:嶽麓書社,1995年 6 月),頁 850。

<sup>117 [</sup>清] 汪廷珍:〈江西試牘立誠編續刊文序·附論文法五則〉,《實事求是齋遺稿》(清光緒八年〔1882〕重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卷2,頁104。[清] 劉錦藻撰:《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影印商務印書館1937年3月刊本),卷85,〈選舉二〉,百8442,

 $<sup>^{118}</sup>$  [清] 阮葵生:《茶餘客話》(《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十四年〔1888〕鉛印本),卷  $^{16}$  ,頁  $^{4}$  。

<sup>119 [</sup>清]力行堂諸子同識:〈凡例〉,[清]呂留良:《天蓋樓偶評--小題觀略》,卷前,頁4。 引述呂留良言。

<sup>120</sup> 參筆者:〈明清士人對「評點」的批評〉,頁 236,〈評點常是標榜的手段〉一小節。

<sup>121</sup>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恩國泰等:〈禮部尚書恩國泰敬陳學政之要事題本〉,頁24。

<sup>122 [</sup>明]徐光啓:《詩經傳稿》,收入於《徐光啓著譯集》第 18、19 冊 (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1983 年,影印清康熙年間徐氏淵源堂家刻本)。

其它文體縱使在形式上或有若干的束縛,但最少在題材、措辭上,擁有較大 的空間,而八股文主題立論受到經文、註解的牢籠;形式受到破題、承題、起講、 股對……等固定格式的規範;措詞用語也被嚴格的約束,汪廷珍(1757 - 1827) 云:

制義代聖賢立言,選詞官雅,凡史書中後世語、語錄中俚俗語、訓詁語、 詩賦語、詞曲語、小說語、二氏語、官文書語、尺牘語、後儒自造語(原 注:如先天、後天、元會、運世、太極、無極等語,何得入孔孟口中?) 註疏中後人語(原注:如《尚書》今古文、《考工》補〈冬官〉之類)、時 文中杜撰語及子書中寓言不雅馴者,闌入時文,皆從屏置。123

連席字都因可能暗藏關節之故,而曾加以規定、統一。<sup>124</sup>綁手綁腳,時文的作者 可以揮灑的空間極有限,當真是戴著腳鐐跳舞!這是八股文難以有個性、不容易 令人印象鮮明的原因。不只是今人讀來覺得不太有滋味,張溥亦言不愛看時文, 「讀未盡三、四義,輒欠伸欲睡」; 125不只是今人讀來覺得篇篇神似,俞樾也說 「千篇一律」:「闔中閱文,猶走馬看花,想其夜闌人倦之後,燭光搖蕩,朱字麻 茶,且又同此題目、同此文字,千篇一律,其昏昏欲睡久矣。」126

八股不容易展露自我特色、個性,這和作者撰作八股的目的、心態也頗有關 係,俞樾又言:「凡人欲立言傳後,不必作八股文字;凡作八股文字,不過鄉、 會兩試借作敲門甎耳。」正因爲是敲門磚,寫作時文時,不爲立言傳後、不重抒 發自我情志,而是「每代閱文者設想」,「作文不揣摩閱者之意,如何可以動目?」 <sup>127</sup>晚明俞琬綸因此嘆息:「人生苦境多已,至我輩復爲舉業籠囚,屈曲己靈,揣 

<sup>123 [</sup>清] 汪廷珍:〈安徽試牘立誠編文序·附條約十八則 并示〉、《實事求是齋遺稿》、卷2、頁

<sup>124 [</sup>清]梁章鉅撰,陳居淵點校:《制義叢話》,卷 23,頁 434。乾隆四十二年上諭:「令順天及 各省主考官,於刊發題目時,即酌定三篇內承題、起講應用虛字,明白開列,另行刊印一紙,分 給舉子。如此科首篇承是用『夫』字,次篇用『蓋』字,三篇用『甚矣』; 起講首篇用『今夫』, 次篇用『且夫』,三篇用『嘗思』之類。下科即將此等虛字錯綜更換,總聽主考臨時酌定,俾通 場一體遵用。違者貼出 如此於不齊之中寓以齊,則雖欲暗藏關節,應無所施其伎倆。」

<sup>125 [</sup>明]張溥:〈房書藝志序〉、《七錄齋詩文合集》、〈近稿〉、卷1、頁29。

<sup>126 「</sup>清〕俞樾:〈與王康侯女婿〉,《春在堂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42 輯,1969 年影印清末刻本),卷3,頁5-6。

<sup>127</sup> 同前計。

<sup>&</sup>lt;sup>128</sup>〔明〕俞琬綸:〈與客〉,〔清〕周亮工評選:《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 7,頁 24。按:同卷

加上屢考不中的自我懷疑,多數的考生,不時在調整、修正自己的寫作策略。如 艾南英言:「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爲秦漢子史之文,而闈中 目之爲野;改而從震澤、毘陵、成、宏先正之體,而闈中又目之爲老;近則雖以 《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爲何語?」<sup>129</sup> 帥我(…1711…)云:

余籍邑學十年,與大比者三,始好為汪洋縱肆嶔崎歷落之文,群目為野。 兩試輟放,宜已改絃易轍,并心揣摩為守谿、荊川、文潔、葵陽之業,規 規不失尺寸,又行以浩氣,賁以新詞,私用自喜,父兄、戚友、交游亦謂 有司尺度固當如是。比徹棘,……被放猶故也。<sup>130</sup>

帥我與艾南英一樣,都是在屢試不遇的情況下自我調整。陸求可(…1655…)也 曾自言其文數變,細數逾九變之多。<sup>131</sup>惴惴然「屢變時體以就主司之幅尺」<sup>132</sup>, 本爲考生的常態,到底那一階段、那一變,才是作者風格的代言?

由是之故,我們從事八股文的研究,擇題一定得審慎考量,以免造成研究難以進行。在筆者看來,以評價八股文的得失、風格爲題,可說是八股文研究中較難深入處理的課題。若不能回避,必須對某位時文作者的風格做出評論時,除了廣泛搜集時文文本、前人相關的評論以爲依據外,研究者一定得思考:在一篇八股文中,那些文字是屬於經傳註解的傳聲筒?<sup>133</sup>那些是屬於眾口同聲、人云亦云

頁 23 有〈與姚孟長〉、〈與周玉繩〉,俞氏應與姚希孟(1575? - 1632?)、周延儒(1595 - 1644) 約略同時。

129 [明]艾南英:〈前歷試卷自敘〉,《天傭子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年10月),卷2, 頁6。震澤、毘陵指王鏊、唐順之。

130 [清] 帥我:〈書甲子落卷後〉,《墨瀾亭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光緒奉新帥氏綠窗刻《帥氏清芬集》本),不分卷,頁 1-2。守谿、荆川、文潔、葵陽,分指:王鏊、唐順之、鄧以讚、黃洪憲等時文名家。

 $^{131}$  [清] 陸求可:〈四書稿自序〉,《陸密菴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影印清康熙二十年 [ 1681 ] 王霖刻本),卷 5,頁 3 - 5。

132 [明]陳堯:〈曹納川膺貢序〉,《梧岡文正續兩集合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影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陳世●輯鈔本),卷 5,未標頁數,總頁 409。

133如郭驤在所作〈《詩經傳稿》與徐光啓早年思想管窺〉中,引述徐氏八股文作爲早年思想的證明。然而,八股文的寫作,必定要受題目、經傳的牢籠 - - 這是八股文的宿命,徐氏不能豁免,換成其它作者寫同樣的題目,也只能如是發揮。所以,徐氏八股文所述,那些成份是經傳意旨?那些是徐氏思想的展露?有待進一步釐清。郭文收入於宋浩杰主編:《中西文化會通第一人:徐光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頁189-195。

者?在八股趨時、隨波逐流、逐主司所好,甚至東抄西襲的情況下,那些敘述、成份還能代表作者個人的特色?考量了這些,或者論述時較不致流於自以爲是、失之偏頗。

#### 六、結語

筆者在本文中,首先強調八股文對明清兩代的影響是既深刻且全面的,呼籲學者,宜屏除成見,共同來耕耘這塊前人較忽略的領域。續又分析先前八股文研究不振之故,除了受到歷來對八股文惡評的影響之外,八股文文體之難、文法之細密,再加上求新尚變的特色等,形成今人難以跨越的鴻溝,令研究者望而卻步。

而就文獻的角度而言,科舉文獻涵蓋廣闊,制度因時修正,建立研究的基礎知識頗爲不易。個人文集中大都不收八股文,連時文序亦多捨棄,時文選本常過時即廢,再加上光緒末年廢除八股取士,一切科舉用書歸諸無用,向來書目又都不重視科舉用書,文獻的湮滅、遺佚甚爲嚴重,讓研究者在搜羅研究文獻時,頗爲吃力。而時文選家所錄,乃爲讀者、考試服務,多有改易,真僞難辨。而且,比起其它文體,八股文在內容、形式、措詞用語等,受到嚴格的束縛。作者殫精竭慮,不重在立言及抒發個人情志,而是揣摩主司所好、風氣所趨,此皆使吾人在辨識、論定時文作者的風格時更爲困難。

筆者在本文中,呈現這些八股文研究的問題、疑難,期能提醒有志研究者注意,盼能對提升八股文的研究品質,略有綿薄之助益。

附記:本文初稿,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推薦, 並惠賜寶貴意見。

## 徵引文獻

## 一、古籍

#### (一) 明

- 明•王世貞撰,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2月。
- 明•支大綸,《支華平先生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清旦閣刻本。
- 明·王思任,《謔菴文飯小品》,《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順治十五年〔1658〕王 鼎起刻本。
- 明·艾南英,《天傭子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年10月。
- 明·李 樂,《見聞雜記》,臺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年9月。
- 明•李光縉、《景璧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4月影印明崇禎十

- 年〔1637〕刊本。
-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 刻本。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0月。
- 明·武叔卿,《舉業巵言》,清道光十五年〔1835〕朝邑劉氏刊本,臺北:中央 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 明·姚希孟,《響玉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張叔籟等刻《清閟全集》 本。
- 明·唐文獻,《唐文恪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楊鶴崔爾進刻本。
- 明·徐學聚、《國朝典彙》,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5月,《中國史學叢書》 影印明崇禎刊本。
- 明·徐光啓,《詩經傳稿》,收入於《徐光啓著譯集》第18、19冊(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1983年,影印清康熙年間徐氏淵源堂家刻本)。
- 明·陳堯,《梧岡文正續兩集合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陳世●輯鈔本。
- 明·陳名夏,《石雲居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影印清順治三年〔1646〕 刻本。
- 明·陳際泰,《巳吾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順治李來泰刻本。
- 明·陳際泰撰,清·呂留良輯評,《陳大士先生稿》,清康熙天蓋樓刊本,臺北: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 明•陳龍正,《幾亭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雲書閣刻本。
- 明·陶望齡,《陶文簡公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天啓陶履中刻本。
- 明·湯賓尹,《睡庵稿》,《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萬曆刻本。
- 明·張 溥,《七錄齋詩文合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崇禎九年〔1636〕刻 本。
- 明·董其昌,《容臺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年7月,影印明崇禎三年〔1630〕原刻本。
- 明‧鄭元勳輯,《媚幽閣文娛二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刻本。
- 明‧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天啟刻本。
- 明•歸有光撰,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臺北:源流出版社,1983年4月。
- 明·瞿景淳,《瞿文懿公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瞿汝稷刻本。

#### (二) 清

- 清·方 苞撰,劉季高點校,《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清·方 苞選評,《欽定四書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船山全書》(十五),長沙:嶽麓書社,1995

年6月。

- 清·王先謙、《東華續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十年[1884]王氏刻本。
- 清·王步青,《巳山先生別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乾隆敦復堂刻本。
- 清·田 雯,《古歡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伍涵芬,《讀書樂趣》,《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 刻本。
- 清·吳肅公,《讀書論世》,《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詒清堂刻本。
-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十四年〔1888〕鉛印本。
- 清·呂留良,《十二科程墨觀略》,清順治二年〔1646〕至康熙十二年〔1673〕呂 氏天蓋樓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 清·呂留良,《天蓋樓偶評 - 小題觀略》,清康熙十二年〔1673〕石門呂氏天蓋 樓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 清·呂留良,《呂晚邨先生論文彙鈔》,《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三十五年 〔1696〕呂氏家塾刻本。
- 清·呂留良,《呂晚邨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3月。
- 清·李 紱,《穆堂別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十一年〔1831〕奉國堂 刻本。
- 清·李 漁、《李笠翁曲話》、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筆記三編》本。
- 清·汪廷珍,《實事求是齋遺稿》,清光緒八年〔1882〕重刊本,臺北:中央研究 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 清·周亮工評選,《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賴古 堂刻本。
- 清·法式善,《存素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二年〔1807〕程邦 瑞揚州刻增修本。
- 清·金匱闕鑄補齋編輯、《皇朝新政文編》、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 叢刊》三編第30輯影印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中西譯書會印本。
- 清·俞 樾,《春在堂尺牘》、《春在堂雜文》,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2輯,1969年影印清末刻本。
- 清·姚 鼐撰,劉季高標校,《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11月。
- 清·帥 我,《墨瀾亭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光緒奉新帥氏綠窗刻 《帥氏清芬集》本。
- 清·洪若臯,《南沙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刻本。
- 清·紀 昀奉敕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1月。
- 清·唐 彪,《父師善誘法》,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11月。
- 清·素爾訥等撰、《欽定學政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

武英殿刻本。

- 清·袁 枚撰,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8月。
- 清·康有爲,《戊戌奏稿》,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33 輯影印辛亥〔1911〕刊本。
-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清·張 英,《文端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梁章鉅著,陳居淵點校,《制義叢話》,上海:上海書店,2001年12月。
- 清·盛 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85輯影印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刊本。
- 清·許汝霖,《德星堂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刻本。
- 清·陳廷敬等奉敕編、《皇清文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陳康祺撰,張文玲點校,《郎潛紀聞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3月。
- 清·陸世儀,《思辨錄輯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陸求可,《陸密菴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二十年〔1681〕 王霖刻本。
- 清·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8月。
- 清·路 德,《檉華館全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七年〔1881〕解梁刻 本。
- 清·趙吉士,《萬青閣全集·萬青閣制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趙 繼抃等刻本。
-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影印商務印書館1937年3月刊本。
- 清·錢 禮,《錢南園遺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同治十一年〔1872〕劉崐 長沙刻本。
- 清·錢澄之,《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8月。
- 清·戴名世撰,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9月。
- 清·謝章鋌,《賭棋山莊筆記》,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影印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刊本。
- 清·嚴可均,《鐵橋漫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十八年〔1838〕四錄堂 刻本。
- 清·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 4 月。
- 清·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3月。

### 二、近人論著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 1987 〈順治年間科舉題本選〉,《歷史檔案》1987 年

第3期(總第27期),頁16-26,轉頁15。

宋浩杰主編 2006 《中西文化會通第一人:徐光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吳承學 2000 《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吳承學等 1994 〈一個期待關注的學術領域 - - 明清詩文研究三人談〉,《文學 遺產》第4期,頁1-16。

周作人 1982 《看雲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 年 6 月影印民國廿一年上海 開明書店版。

周彥文 1997〈論歷代書目中的制舉類書籍〉、《中國書目季刊》第 31 卷第 1 期, 百 1 - 13。

金克木 1993 〈紅樓八股硯香詞〉,《讀書》1993 年第8期,頁75-85。

侯美珍 2004 〈明清士人對「評點」的批評〉,《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4 卷第 3 期,頁 238 - 239。

侯美珍 2004 〈毛奇齡「季跪小品制文引」析論 - - 兼談「稗官野乘,悉爲制 義新編」的意涵〉,《臺大中文學報》第 21 期,頁 185 - 214。

侯美珍 2005 〈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23 期,百277-322。

侯美珍 2006 〈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臺大中文學報》第 25 期,頁 153 - 198。

馬敘倫 1995 《石屋續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高明揚、蔣金星 2005 〈清代文化政策對八股文衡文標準的影響〉、《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2005 年第 4 期, 頁 480 - 485。

涂經詒撰、鄭邦鎮譯 1984 〈從文學觀點論八股文〉、《中外文學》第 12 卷第 12 期,頁 167 - 180。

商衍鎏 1975 《清代科舉考試述錄》,臺北:文海出版社。

張中行 1998 《閑話八股文》,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啓 功等 1994 《說八股》,北京:中華書局。

陳書祿 1996 《明代詩文的演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舒 蕪 2000 《周作人的是非功渦》,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葉國良 1994〈八股文的淵源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6期,頁39-58。

劉祥光 1996 〈時文稿: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22 期,頁 49 - 68。

劉海峰 2003 〈科舉文獻與「科舉學」〉,《臺大歷史學報》第 32 期, 頁 269 - 297。

劉海峰 2005 《科舉學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鄧嗣禹 1982 《中國考試制度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鄧雲鄉 2001 《水流雲在叢稿》,北京:中華書局。

盧 前 1937 《八股文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鍾毓龍 1990 《科場回憶錄》,收入於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文史資料精選》(1),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戴華萱 2001 《崑山歸有光研究 - - 明代地方型文人的初步考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6月,黃明理先生指導。

鄺健行 1999 《科舉考試文體論稿:律賦與八股文》,臺北:臺灣書店。